

赫鲁晓夫 执政十年

——阿朱别依的回忆



27

出版社

赫鲁晓夫执政十年

——阿朱别依的回忆

屈洪 宋洪训 程海 译

彬 强 编注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北京百万庄大街8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16,000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ISBN 7-5036-0439-5/D·336

定价 3.6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赫鲁晓夫执政十年	(1)
——阿朱别依的回忆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219)
(原题:《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注释	(291)
附录	
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1934年)当选的 中央委员的命运	(315)

赫鲁晓夫执政十年

——阿朱别依的回忆

1966 年新年，我和妻子是在我们的亲密朋友家里度过的。他们住的那套房间的窗户朝着伏龙芝滨河街，从窗户可以瞭望白雪覆盖的莫斯科运河，高尔基公园林荫道上的滑冰场以及场上飞速奔驰的身影。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彩灯，闪闪发光的“转轮”……光与色彩交相辉映，形成一个光环，镶在游乐园四周，游乐园里是一片黑暗——城市里少有的黑暗。光明与黑暗就象童话中的善与恶，这和我们的心情非常吻合，我们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等待着克里姆林宫的钟楼敲打十二响钟声。

昏暗的列车从环形立交桥的钢轨上轰隆轰隆驶过。我对在节日期间坚持工作的人们始终抱有同情。报界人士也常常这样值班。那天晚上，我在《消息报》工作的同事们把版面拿给另一个编辑签字，我现在则过着幽闲的节日夜晚。

凌晨时分，几位客人姗姗来迟——一位是著名的演员，带

着夫人，另一位是有很高军衔的军官。妇女们数着他肩上的星花，在男人的帮助下确定：他是一位上将。

“我们同将军刚刚认识，不过这已经是去年，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招待会上。请大家多多关照。”——演员介绍了军官的姓名，大概他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

应该感谢将军同意来这里“玩一个通宵”。看来，他在生人家里并不那么感到拘束。人们在迎接新年时好象都很善良、明智，彼此都是朋友。客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家的主人——他高大的身躯，洪亮的嗓音，善于热情待客，能使疲倦的客人保持饱满的精神和情绪，就象一个有经验的篝火管理人，能随时添柴，使篝火一直熊熊燃烧。

人的一生有多少这样的夜晚，在意味深长的谈话中要花费多少口舌，而在这些谈话后面，常常是除了表示一下在生活环境的重压下埋在心底的不切实际的愿望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而我们大家总是说了又说，滔滔不绝，就象契诃夫笔下的人物那样，收不住嘴，尽管大家都知道，语言汇成的瀑布和尼亚加拉瀑布^[2]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那一天的新年“夜话”，如果不是有那位将军，恐怕早被忘却了。我没有注意，同主人的谈话在什么时候达到高潮。从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可以了解到，谈的是关于赫鲁晓夫^[3]被撤职的事，是关于在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事情又会怎样发展。

“而我要对你说，这是我国历史上虚度的十年，可诅咒的十年。”将军几乎是在叫喊，“你还是快点把它忘掉吧，否则你就得辞职，你再也不会受到信任！”

主人反驳客人，客人生气了，开始扣上军服的钮扣，拉住演员的肩膀说：“走吧！我看也还算是愉快的伙伴……”

演员好象正在打盹。他用一双纤细的手捂着眼睛，但是我看到他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并且来回抽动。我知道他是一个爱发火的、脾气暴躁的人，我们在艺术剧院附属戏剧学校一起学习过；我知道，他现在可能要发作，那时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站起身来，非常平静地、客气地、不紧不慢地说：“将军，可我却认为这十年是伟大的十年。我们同您在评价这件事情上有分歧。每个人都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您为什么甚至不允许我们的主人有自己的观点呢？……”

我国生活中的十年——1954年至1964年几乎不再被人提起，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十年呢？难道不是一个巨大国家的人民劳动和生活的十年，在无数冲突和种种复杂情况下，亿万人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的十年？为什么有人执意要把这十年从我们的记忆中抹掉，好象这十年有什么罪过似的？难道能按照一两个即使是最有权威的人的意志，就这样简单地把一些名字、事实、数字、对比都从书中和影片中剪掉吗？

围绕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制造的沉默不仅达到了极点，而且我要说，是心怀叵测的。天真的人们认为，沉默的基本原因，是对赫鲁晓夫所从事的党的活动和国务活动作出的否定的评价。但是主要的原因却在其他方面。这就是他敢于触动的那个行政官僚体制“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是这个体制在用独特的方式“显示力量”，并以此来警告后人：“不要触动我们！”

任何最完善的计算机也不能对那些不很安宁也不很简单的年代作出无可争议的评价。那种想用黑色或玫瑰色画笔不仅重新描绘那十年，而且重新描绘我国整整七十年历史的愿望本身就是荒谬的。

只有当所有头脑健全的人要求把人民的历史还给人民的宿愿能够得到满足时，理智地思考问题的理智的时刻才会到来。事情定会是这样。许多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事件的见证人和参加者都在努力这样做。在这个自觉的过程中，我们希望，也会对“赫鲁晓夫的十年”进行客观的分析。

忘记过去是危险的，“忘记”和“停滞”是同类词，摧毁支持这种现象的势力是完全可能的，也是绝对必要的。在这里没有沸腾的热情，没有损失和痛苦是不行的，当然，会有所得也是肯定的。在我们的时代喜与忧相伴而行，如同在二十大以后那些已经是久远的年代里喜与忧连在一起一样。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和二十大的决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多数朋友们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他们中间有纳杰拉·格奥尔吉耶夫娜·洛尔基巴尼泽和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萨任。我知道，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叶弗列莫夫，就是那个把“春风得意的”将军“带到”纳杰拉和维克多家里来的演员，也是忠于自己的青年时代的。

我们的朋友现在仍住在伏龙芝滨河街。他们的女儿纳塔莎已经长大，并且已经出嫁，我们的三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在那个新年之夜，他们都在安睡，不知道长辈进行的争论。他们常常问，很久以前和不久以前国内都发生了什么事，是怎样发生的。而我們也需要把这些都告诉他们。

在回忆过去所经历的事情时，我并不责备自己没有记详细的笔记和日记。摆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那种充满耸人听闻的种种内幕新闻的回忆录。这是一个新闻记者的笔记，他最初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后来，在那久已不再提及的年代，来

到了《消息报》。

我的“日记”——就是记忆和报纸杂志的合订本，其中反映了我的观点和兴趣。说我能避免主观的评价，那是幼稚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将竭力从事实出发。

“报人离不开事实，就象矿工离不开粉尘。”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沃依^①曾用这句话教导《共青团真理报》的年轻记者。他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一次选举时，我的任务是写列宁格勒的一位工人代表候选人。我到了彼得格勒，同一个人详谈了很久。跑到他家喝茶，同他的家人认识。当一篇特写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刊出以后，我就把一张写有我的签名的报纸寄给了他。我收到了他这样的回答：‘您一切写得都对，记者同志，但是您为什么要写我在镜子面前梳头呢？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是秃顶吗？’我的弟兄们，”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激动地高声说道，“可不要把梳子变成我们这一职业的挖掘工具。”

我认为重要的是还必须遵守另一条规则。不能用我们当前的观念的尺度来衡量过去，不能忘记事件是发生在当时当地，而不是此时此地，再没有比充满幻想的叹息“哎，要是……”更无济于事的了。当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感觉到二十大的爆发力开始走向低潮，踏步不前将会导致倒退时，本来是可以猜测一下其中的原因的。我们已经看到一条完整的依赖关系的链条。我们来责备自己，也就是责备那些坚决拥护二十大事业的人吗？或者，老实说，是我们缺乏维护自己观点的力量吗？

^① 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长篇小说《真正的人》的作者，《青春》杂志主编。——编者

我们是否认为某种事情的发生是由于那种该死的爱搞调和一致和追求生活安逸的习惯呢？也许可以把一切都记在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账上。^①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也是一个最方便的办法，每一个人当他无法理解时，都可以意味深长地耸耸肩膀这样说。

让我们避免采取这种做法吧。现在，当公开性不仅大大增加了说话的份量和责任心，而且大大扩大了说话的渠道时，可惜，一些过去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受过重大损失的人，常常最容易也最急于宣布真理。

我常对我的孩子们说：是的，我们有过错。我们有过错，是因为我们都是孤来独往，还由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克制没有象诡谲地纠集在一起的官僚阶层那样行动。我常常提醒他们记住一句格言：“不要责备那些来不及或不能做某些事情的人，不要妨碍正在完成某种工作的人，主要的是要赶快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1987年春天，在《消息报》纪念创刊70周年的时候，我被邀请参加纪念大会，而且被选入了主席团。由于二十年不在《消息报》工作，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大喜事。那天晚上我又看到了许多同事。在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消息报工作者》上面，刊登了该报过去的工作人员写的短文，其中也有我的。我当时是这样写的：“读者明天在报上看到的，报界人士今天就知道了。他们的生活是由经常的超前工作组成的，因此，精力的消耗要

①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时，被指责“在工作中表现出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编者

比自己想象的快得多。在这个《消息报》的喜庆日子里，我想起了那些没有能够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想起了那些从良心和事业来说都值得我们怀念的人。我曾想拿起名单来数，但我停住了：这个名单太沉重了，也太长了。

我在报社没有同亚历山大·鲍文^①一起工作过，但是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不是他们，就是我们，没有第三者，能够体验到职业新闻记者的幸福，而那些想在预备队里躲避风浪的人，是体验不到这种幸福的。我谈这一点，是因为将近三十年以前‘消息报工作者们’所做的‘第一次尝试’并不是毫无结果的。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了，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站在党的原则性、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立场上，如果我们不把职务和服务两个概念混淆起来，报纸将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的职业将能发挥多大的力量。

怎么能不羡慕现在在办《消息报》的人呢！既有进攻的经验，也有时间，不过时间是不会原谅萎靡不振和延误时机的。”

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倒退有时是从小的方面，从不被人注意的方面开始的。后来，当一切都已经不能改变时，你会了解到，这种退潮已经很久很久了，按照上帝赐予的期限来说，可能人的整整一生都是不够的。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二十大为斯大林专横时期无辜牺牲的成千上万的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但是对于这些倒下的人来说，反正已经都是一样。同样，我们是否建立已经答应给他们建立的纪念碑，对于他们来说也都一样。可是对于我们，为了执行我们的

① 苏联新闻工作者，1972年起任《消息报》政治评论员，1981年起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编者

意志，为了确立理想，建立纪念碑也是需要的。违背人民意愿建立纪念碑却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建立起来的纪念碑会很容易从底座上倒下来。

在那天纪念《消息报》创刊 70 周年的晚会上，有一位熟悉的作家说：“我们还算幸运。我们是在二十大以后开始工作的，我希望，我们还来得及在二十七次以后做些什么。”

我们两个都知道，一切都不会那么简单。要知道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抱怨说：可惜，“赫鲁晓夫的一代”还没有离开我们。他们总是幻想“有力的手”，“有力的政权”，认为这才是医治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又有什么，这并不新鲜。托洛茨基分子也说，没有什么比民主更反动的了。那位“春风得意的”将军，也许由于考虑不周，也说出了类似的话。

迈洛尔·斯图鲁阿也在《消息报》的纪念专刊上写了文章。1959 年，他是积极的、所谓思想最活跃的记者之一。我们一起，一个主编，一个记者，无拘无束地跑到印刷厂的排版台，去更换那些令人厌恶的公式化的标题。我们抓住一切机会，来摆脱那种平淡、枯燥、单调的文风，设法引起读者的兴趣。

有一次，迈洛尔接受编辑部的紧急任务到叶利谢耶夫商店买了 4 公斤黑鱼子酱，当夜把它送到舍列梅捷沃，请求英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把包裹带到伦敦。当我在电话中请求查理·卓别林^①把他写的《自传》中的一些章节在我们报纸上首先发表时，他提出的稿酬就是这种东西。书就要在书店出售了，再过一个星期，《星期日泰晤士报》准备刊载该书的片断。

① 美国演员，电影导演和编剧。他在电影作品中创造了一些形式为喜剧而本质上是悲剧的“小人物”形象。——编者

他解释说，出书时要举行盛大宴会，鱼子酱非常合适。

当我们的驻英记者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把一大包东西——一锅由我们报社食堂用冰覆盖好、包装好的4公斤鱼子酱送到旅馆时，卓别林对我们的记者说：“简直是疯了，这些年轻人真使我没有办法。”——他把稿子给了我们。

卓别林很守信用。

我们的记者拿到稿子以后坐在电话机旁，立即翻译，向速记员口授了书中很精彩的一段，足够占满报纸的一个版面。当天，我们就把它发表了。读者们为得到一篇不寻常的材料而高兴，附记中还谈到这篇材料是怎样得到的，这也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们“把笔刺向了”西方报纸，特别是《星期日泰晤士报》。原来，在此以前不久，该报主编曾来《消息报》访问，他不无自信地企图教训我们，要提高工作效率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他们的大编辑看到《消息报》上登了卓别林的书的片断以后，竟然决心给我们的编辑部打电话，请求允许他们派自己的一位工作人员来莫斯科见习。

顺便提一下。我们的会计师也感到高兴，因为发表这篇材料没有花他一个戈比的外汇。当时，即1960年，一公斤鱼子酱卖22个卢布，我们没有去查问，当时在伦敦值多少钱。大概要比我们这里贵一些。

这里插入这么一段插曲是为了说明，我为什么要引用迈洛尔·格奥尔吉耶维奇在《消息报工作者》报上写的短文：

“我想起了编辑部的一个不眠之夜。这是在60年代初。主编在碰头会上谈了他的不安。

‘二十大以后，报纸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说，‘可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停滞不前，老是在原地踏步。明天在报纸出来以

后，让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讨论这第二步。所有的人都请来。时间不限。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开到第二天早晨。索尼娅将给我们准备好夹肉面包和茶。’

我们开始高谈阔论，讨论如何迈出第二步的问题。于是新的思想，新的栏目，新的设想纷纷提出，连女速记员都来不及把我们的话记下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夜里。窗外已经晨光熹微。突然，一种莫名其妙的忧愁笼罩在我们心头。我们感觉到，我们所有的似乎带有启发性的建议，同迈出第二步毫不相干。从实质上说，它们不过是经过梳妆打扮以后仍在原地跑步。忧愁开始变成巨大的痛苦。我再也忍耐不住，开始发言。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说，‘我们的不眠之夜毫无意义。在党没有迈出第二步之前，报纸不可能迈出第二步。’

会场上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向主编。大家在期待，一声霹雳将把敢于亵渎龙王爷的人击毙。但是任何类似银河系的日珥现象也没有发生。

‘散会吧。迈洛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是对的。’阿列克谢·阿朱别依^①用轻轻的疲倦的声音说……”

在1964年10月的日子里，我们一家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和妻子约定，不在徒劳无益的谈话中议论谁是谁非，不把侮辱和谰言记在心里。我记得很清楚，拉达^①在她父亲被撤职后的最初几天里有一次对我说：“这当然痛苦和冤枉，但是也许今后会好起来。”

这个“今后会好起来”的想法给我注入了一线希望，生活

① 阿朱别依的妻子，赫鲁晓夫的女儿。——编者

——从广义的、社会的意义上说——一定会恢复它一时中断的进程和连续性。不仅我们，很多人都在期望，“第二步”的时期终将到来。

现在，当几乎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以后，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自然会去回顾过去的经历。由于无知而作出匆忙的判决是不好的。所以我决定谈一谈我自己以及我的亲人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那十年当然有它以前的一段历史。

1949年就要结束了。再过两个月，莫斯科大学新闻组三年级的学生过了考期就要到报社去实习。我和拉达住在莫斯科她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住所里准备考试。她父亲当时在乌克兰工作。

格兰诺夫斯基大街的一幢房子，莫斯科的老住户都知道的“苏维埃5号大厦”，过去属于舍列梅切维赫伯爵，它是根据亚力山大·迈斯纳建筑师按照十九世纪末资产者的口味设计的方案建筑的。笨拙的U字形的建筑物的入口处有一所小花园，这很符合主人的愿望。在革命前这里住的都是富人。

在20—30年代，这里住的是政府成员、高级军官和党的活动家。1938年，尼·谢·赫鲁晓夫也在这里得到一处住所——他是从“滨河街的家”搬到这里的。那一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派到乌克兰去担任那里的中央第一书记。他从基辅或前线到莫斯科出差时就住在这里。一半空着的，按照那些年代清心寡欲方式布置的住所——没有地毯，没有玻璃柜橱，没有水晶枝形吊灯，没有油画和版画。台灯的底座是花岗石的，带有“仿青铜”镶边的毛玻璃灯罩看起来很象大蘑菇。

笨重的、样式呆板的家具——床，桌子，椅子，亚麻布罩的沙发，书柜，床头柜；大概在这幢楼房的其他房间里也是这些东西，因为有一套习惯的标准。那时高级要人还不注意“室内装饰”，当时连这个概念本身都还没有进入生活。

后来我才了解到当时这种风尚的来源。原来，斯大林就是按照这种“公式化的”严格标准生活的。在南方，在莫斯科，在莫斯科近郊，在他的住所和别墅里，到处都是这样。木头地板，木头天花板，木头墙壁。家具极少，没有任何油画。所有家具都是在一个工厂按照同一式样制造的。

所有住宅的主人，象赫鲁晓夫一样，都不认为房子里的家具是一般意义上的自己的财产。他们不论住在哪里，那里的东西实际上都不属于他们。在所有的床单和毛巾上面都有“苏维埃5号大厦”的蓝色印记或其他机关标志。桌子、椅子、沙发上都装有金属的登记牌号。不断有一些板着面孔的男子汉拿着本子来核对家具上的号码，好象这里的住户有谁会侵吞这些财富似的。

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和妻子已经复习完课程提要，前厅里发出了声音，有人进入了房间。原来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回来了，他还带着两个人，一个是万达·里沃夫娜·华西列夫斯卡娅^①，另一个是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考涅楚克^②。拉达去厨房帮助女佣人做饭，很快大家都围

① 波兰、苏联女作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0—1964)。——编者

② 苏联乌克兰剧作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1972)，写有剧本《前线》等。——编者

着桌子坐下来。打断长辈们的谈话是不合适的，我们只是从谈话过程中知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刚刚在斯大林那里。回家时，从旅馆里把到莫斯科来办事的华西列夫斯卡娅和考涅楚克拉到了家。

那天晚上，赫鲁晓夫显然只是需要找谈话伙伴聊聊。他说，他要到基辅去交代工作，因为他已被选为莫斯科的州委书记——问题已经决定。

万达·里沃夫娜哭了起来：“乌克兰非常需要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些话感动了赫鲁晓夫。他知道，万达·里沃夫娜说的是真心话。她是波兰和苏联的一位女作家，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战争年代，她积极为报刊写稿，在前线认识了赫鲁晓夫。华西列夫斯卡娅 1942 年出的中篇小说《虹》，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它被称为战斗的书。

华西列夫斯卡娅和考涅楚克都很珍视赫鲁晓夫的友情。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是著名的剧作家，是《舰队的毁灭》、《普拉东·克列契特》、《前线》的作者，他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曾坚决维护过考涅楚克，他是丹凯维奇的歌剧《鲍格丹·赫梅里尼茨基》的歌词作者。这个歌剧在 1951 年夏天举行的乌克兰文学艺术旬期间上演。《真理报》登了一篇文章，批评该剧剧本在文学历史部分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这种指责是严厉的。后来赫鲁晓夫说，他花了很大力气才平息了斯大林的怒火。允许作者自己进行必要的修改。这样，《鲍格丹·赫梅里尼茨基》才没有列入被批判的文学音乐作品名单，对这些作品中央作出了严厉的决定。

万达·里沃夫娜·华西列夫斯卡娅于 1964 年 7 月逝世，她当然不会知道后来赫鲁晓夫被撤职的事。不知道亚历山

大·考涅楚克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不管怎样，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逝世时，尼娜·彼得罗夫娜^①从考涅楚克那里连一句简短的吊唁的话也没有收到。

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题目。正象伊里亚·爱伦堡^②写的那样，“电话突然不响了……”仅仅能用记性不好和缺乏礼貌来解释这种突然的变化吗？记性不好和缺乏礼貌——这已经是派生的东西，根子却要深一些。根源在于自己把自己隔绝起来，在于有一种恐惧心理，千万不可轻率从事。同一个人吃了，喝了，一同打过猎，钓过鱼，经常去作客，征求意见，请求帮助，可是突然，好象从来不认识一样。卑鄙的恐惧心理已经浸入骨髓：可不要有谁记起，还有你，老兄，常去作客，把自己算作战友；可不要有谁记起，并出来指责；可不要降职，可不要失去什么……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不少。

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开始退潮，那些溅起过浪花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干涸的土地……

在斯大林突然作出把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的决定背后有什么原因吗？现在谁也不知道，就象谁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当时都谈了些什么一样。

但是这次“干部调动”虽然表面看来象是一次临时决定，实际上确有以下几点考虑。似乎，在斯大林看来，把赫鲁晓夫留在乌克兰更合适些。那里的工作进展很快，这个共和国给全

① 赫鲁晓夫的妻子。——编者

② 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的作者。——编者